

“象牙塔”，既要走进也要超越

Both Entering and Surpassing the “Ivory Tower”

肖海涛

(深圳大学高教所 深圳 518060)

人们常用“象牙塔”(ivory tower, 以下不加引号)来比喻大学, 并将它与神圣性和封闭性联系在一起。现在一般认为, 现代大学不同于传统的大学, 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, 大学应该超越象牙塔。笔者认为, 这种超越, 是指带着象牙塔精神超越象牙塔; 对于中国大学而言, 由于我们的特殊情况, 首先是要走进甚至是要建立象牙塔, 然后才是超越象牙塔。也就是说,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: 既要走进, 也要超越。

这里, 所谓走进象牙塔, 也包括建立象牙塔, 是指以象牙塔的理性精神, 探求学术, 追求真理; 所谓超越象牙塔, 是指带着象牙塔精神走出象牙塔, 满足社会需要。只有走进象牙塔, 才有超越象牙塔; 走进象牙塔与超越象牙塔相结合, 大学才能更全面地承担社会责任。

一、大学的本质与象牙塔的象征意义

追溯大学的起源与本质,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象牙塔的涵义。

从一般意义上讲, 大学起源于西方, 其萌芽是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所创立的阿卡德米(academy)学园, 这种学园培养了大批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; 其诞生则是中世纪被称作 universitatis 的学者行会的出现。这种学者行会在地方政府和教会之间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权(autonomy), 即在学术问题上, 学者们是一个自治团体, 可以单独解决这一问题, 因而, 有时人们也将大学称作学者的王国。随之, 学

社会提供全面的服务。而健全的、进步的、高水平的社会教育, 不仅需要教育自身的积极努力, 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因为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, 任何大的改变和发展, 都需要社会大系统的支持和帮助, 需要国家为其创造进步的基础和条件。国家应该尽其所为来促进教育的进步, 从教育立法, 到教育改制(体制改革); 从教育投入, 到教育评估; 凡属于和教育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的环节, 都应以前新的姿态和思路来组织和运

者们也得到了另一种权利——学术自由(academic freedom), 即学者们在科目的教学中可以自由讨论、自由辩论。例如, 神学在当时是一门主要的教学科目, 它在教堂中虽被认为是已经确立的真理, 要求人们毫不怀疑地去接受它, 但在大学中, 神学也是可以在一定限制下(certain limits), 通过各个专业领域所发现的真理进行讨论和辩论, 并整合进一个更宽广的思想领域之中; 学者们并不会因此而受到迫害。因而,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, 中世纪的大学一经产生就争取到了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权利, 并对西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因此, 西方有学者认为, 欧洲大学基本的学术价值体系也许可以概括为一对孪生(twin)概念: 自治和学术自由。^[1]

由此可见, 西方大学几乎从一开始就享有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权利。对于大学的发展来说, 这是极为重要的权利, 它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, 使得大学有条件将研究高深学问作为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, 甚至是“为了学术而学术”。美国当代学者约翰·S·布鲁贝克曾写过一本《高等教育哲学》。他认为, 大体上, 大学确立它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, 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。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, 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。根据认识论的观点, 大学存在的目的就是“以闲逸的好奇”精神追求知识, 追求高深学问。他们力求了解他们生存的世界, 就像做一件好奇的事情一样。根据政治论的观点, 大学探求深奥的知识, 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, 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。^[2]如果借用布鲁贝克的分析, 我们

行。尤其是在克服传统社会对教育的限制和束缚的问题上, 国家应坚决地革除积弊, 摒弃“官本位”等封建意识, 改变社会组织中对教育的单向制约关系, 形成与教育相互制约、相互服务的良性关系, 帮助教育恢复自身的本质和相对独立性, 从更高的意义上促进教育的进步。

参 考 文 献

[1] 孔宪铎. 科教兴国, 三问三议. 科技导报. 1999(2)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

可以发现,大学作为传承和发展文化的机构,其存在的哲学基础开始时就是认识论的,它是一个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。这时的大学相当重视纯学问的研究,以追求真理为目的,以至于有些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,看起来像完全脱离了校外的时事一样。因此,“毫不奇怪,许多人像19世纪的圣伯夫那样把大学称为‘象牙塔’。不过,在20世纪,象牙塔的存在不是没有根据的,它摆脱了外界的束缚,放弃了暂时利益,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。”^[3]

也就是说,最早将大学比喻成象牙塔的是法国作家与批评家圣伯夫(Charles Augustine Saint-Bevre, 1804-1869),他在批评诗人樊宜(Vigny)时用此语,与“艺术之宫”(palace of art)同义。所谓“艺术之宫”,是英国诗人丁尼孙(Alfred Tennyson, 1809-1892)创用之语,即主张为艺术而艺术,无视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悲惨,自隐于其理想中的美满境地进行创作。其称此境地为“艺术之宫”。鲁迅则认为,为艺术而艺术是艺术自觉的一种表现(见《而已集·魏晋文章及风度与药及酒的关系》)。

可以说,用象牙塔一词来比喻和形容当时的大学,并非贬义,而含有纯洁典雅、高贵神圣的象征意义,并与传统的大学精神相连。作为文化学意义的解释,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:“‘塔’具有宗教性和神秘性的文化内涵,而‘象牙’则象征着洁白、高贵、神圣、坚韧等品性。显然,象牙塔不是一个概念,而是一个象征。”^[4]作为一种象征,它提醒人们,大学是以探求高深知识或学术为根基的,大学是探求高深学问、追求真理、关怀终极、关注人类命运的地方,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。偏离了这一点,大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。从这一意义上来看,大学作为象牙塔具有永恒的价值。

二、走进象牙塔, 对中国大学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

19世纪后期的清朝末年,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,这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的。无庸讳言,100多年来,中国大学发展迅速,但由于各种原因,对于西方大学的传统精髓,对于那种探求高深学问、追求真理的象牙塔精神,我们并没有从完整意义上吸收过来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走进象牙塔,还没有很好地形成象牙塔传统。因而,中国的大学首先是要走进甚至是建立象牙塔,然后才是超越象牙塔,也就是说,我们面临的任務是双重的;既要“走进”,又要“超越”。究其原因,主要有以下几点。

第一,我国传统文化中,除了战国时代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有“百家争鸣”以外,历来缺少学术自由

的环境和传统,这就很难形成一种象牙塔精神。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系统往往同政治联系太密切,受政治因素干扰太多;在学术上,即使有学术之争,也往往上升为政治之争。在中国历史上,多的是忠君死节的烈士,缺的是为学术献身的勇士。历代的封建统治者,在对知识分子的钳制上可谓是“各显神通”,因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十分惨烈。正如近代著名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所说:“在君主专制下,知识分子不是被杀就是被辱,而表现为气节之士。气节之士当然很可敬佩,但不是应当有的而且是很可悲的。这并不表示一个人不应重视气节、重视道德;而是气节之士是在君主专制的特殊形态下才出现的人物,好像‘家贫出孝子’、‘国难见忠臣’,并不是孝子、忠臣不好,但谁愿意家贫、国难呢?因此当家贫、国难时才出现孝子、忠臣,就多少有些不祥。”^[5]特别是到了清朝,由于统治者大兴“文字狱”,到乾隆年间,知识分子干脆埋头于考据,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形成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的普世病态。对于这一现象及所带来的恶果,牟宗三先生进一步指出:“从此中国学问的传统、命脉就被斩断了。在此之前虽有悲剧,但读书人还有理想性,可承续学问的传统,至此之后传统就断了。演变到清末民初和西方接触时,面对种种大问题的挑战,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丧失了反应的能力,就是因为已丧失了做学问的传统。没有学问就没有思想、思考力,因此也就没有观念,更不会表现观念;只有感性的、世俗的聪明是没有用的。”^[6]

第二,中国近现代大学只有100多年。当然,20世纪早期,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大学,实施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,既促进了学术的繁荣,也初步形成了一种象牙塔精神,并为以后的大学建立了一种典范。但由于接下来的战争及内忧外患的冲击,使得大学很难做到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以“探求高深学问”为宗旨,甚至于“华北虽大,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”。1949年以后,大学有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,但也是好景不长,相当一个时期内政治运动又过多,知识分子被当成“臭老九”来批判,甚至被当成异己分子,知识的尊严遭到践踏。这些给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,使大学无法安心“为学术而学术”。

第三,今天,我们又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,不能静下心来做些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工作,甚至轻视理论的研究。一些人仅仅想做些简单而又能出“经济效益”的事情,总想要理论对经济有明显的“利”与“用”的价值;一些人甚至对“理论脱离实际”作简单化的理解,并形成了一种浮躁的学风,以为搞点走马观花的调查就是理论联系实际。恩格斯说得好,“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,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”。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当然不

能很好地建立民族的理论思维,也很难建立一种追求真理的象牙塔精神。

第四,知识分子尤其是搞基础理论的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偏低。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方面,我们一直在努力,也不断在改善,但总是不尽如人意。总体来看,知识分子的待遇仍然偏低。其原因是复杂的。这里要说的是,搞基础理论的知识分子的确在精神上容易满足于创造带来的快乐,相对而言,他们“忧道不忧贫”;但在物质生活方面,作为活生生的人,他们也要食人间烟火。“经济上的压迫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思考的,虽然从事任何有价值的活动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,但内心的满足是不能当作工资的,教授们是不能用他们内心的满足来填饱他们妻儿肚皮的。”^[7]知识分子待遇的偏低使 they 要分散大量精力“为稻粱谋”,甚至去从事“第二职业”,也就不可能完全安心地做学问。

第五,学术体制不健全。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“大面积”地评职称。只要是与学校沾了一点边,什么人都可以评教授,甚至出现了一些“不教不授的教授”、“不研不究的研究员”,这看似“提高”了知识分子的待遇,实际上既降低了真正知识分子的待遇,更降低了学术水准。加之,这一切又与权力和金钱联系在一起,使得学术发展受到的干扰因素太多,使得论资历排辈现象严重,使得真正优秀的创新人才很难脱颖而出,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。

大学的根基是什么?大学的精神是什么?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,我们应该对大学注入象牙塔的理性精神;在改革大学的时候,我们应该为大学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。大学应该成为社会的一种矫正力量,不能为世俗所左右,不能事事随世俗之风转舵,以至失去远大的精神目标追求。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说:“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,要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。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,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(want),而是社会所需要的(need)。”^[8]这样,大学就可以保持一种批判精神和反省精神,引导社会健康地发展。

三、超越象牙塔,把握时代精神

大学固然需要象牙塔的精神,但不能仅仅躲在象牙塔里面而将社会问题置之度外,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,它必须参与社会变革。超越象牙塔,顺应时代的发展,满足社会的需要,是现代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。

我们正经历着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阶段,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的社会经济形态——知识经济——正在形成。一方面,科学技术高度分化、高度综合并走向尖端;另一方面,科学技术已

进入千家万户,深入寻常百姓家。科学技术的发展,以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,要求大学站在时代的前沿,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,将科学技术引向为人类造福的征途。
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大学是根本摆脱不了为社会服务的职能的。这个时代的大学不再仅仅是、也不可能仅仅是远离世俗的“象牙塔”,它必须走出“象牙塔”,超越“象牙塔”,面向社会,主动介入社会生活,全面推进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与社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,甚至成为一种“社会大学”(Communiversality)。英国学者阿什比在《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》中指出:“在过去,每所大学都是独立的有机体,可按其内在规律去吸收营养和发育成长。如今的大学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产物。”^[9]美国人在谈到美国的大学时也说,大学“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。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……它是新思想的源泉、倡导者、推动者和交流中心”。^[10]

从理论上来看,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也不光是认识论的,它还包括社会论的。人们探讨高深的知识,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,而且还因为它要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服务,并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可以说,要看一个国家的未来,就要看它今日的大学;甚至可以说,一个民族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大学手中。因为,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、企业、农业、劳动、原料、国际关系、教育、卫生等等问题,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。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就是大学。更有甚者,随着渴求知识的人和机构的日益增多,大学必须不断地扩展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。也就是说,大学超越“象牙塔”,意味着面向社会、面向大众。

现代大学不仅必须要超越象牙塔,并且它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,成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轴心机构(axial institution)。1973年丹尼尔·贝尔在《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》一书中提出了4点极为重要的思想:“(1)理论知识的编码是现代社会的‘轴心原则’(axial principle);(2)因此,‘知识工人阶级’,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,是越来越关键的或越来越起作用的社会集团;(3)促使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,使尽可能多的能从中受益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;(4)高等教育体制是‘轴心机构’(axial structure),大学(包括与大学分而设之的研究所)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。”^[11]也就是说,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不断进步,更依赖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因而,“大学成了轴心机构,这不仅是从培养知识界精英这一意义上说,而且是从为整个社会提供知识的意义上说。”^[12]

漫谈博士及科研工作

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Doctorat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

魏寿昆

(北京科技大学,教授、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北京 100083)

改革开放以来,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大量培养博士研究生,成绩显著。笔者近年来对培养博士质量问题有所思考,今提出几点意见,聊供商榷。

一、博士学识是否渊博?答案不是、又是

博士是各大学及研究单位培养研究生的最高学位。各国培养博士的制度不同,而一个国家内不同学校的培养制度也不尽相同。有的大学毕业得学士后经硕士再读博士,也有的单位允许直读博士。读博士期间,有的需学生修几门高深的专业课,有的学校则不需要。但各国各单位都必须完成一项科研工作,即所谓的博士论文,证明学生经过培养,已

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;并通过口试答辩及格后方能取得博士证书。博士论文课题的内容非常专细,其范围非常狭小,有时是前人未曾克服的难题,或系前人未曾攻过的有待开拓的新题。虽然,学生耗费了3年的心血可能取得了丰硕成果,但对课题外的学识所知不多,甚至不知。显然,博士是高而深、窄而小的专才,而不是万能的全才。曾有学者称“博士”应译为“专士”,意指博士的学识并不渊博。

博士的学识还可从另一角度评论。

根据导师课题,博士生应广泛地查阅文献(包括论文及书籍),选出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文献,熟读精读,分析归纳,整理提出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,

的确,在新知识的提供和新技术的传播方面,在获取和更新知识方面,在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,现代大学都站在社会的中心,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枢纽和轴心机构。随着社会对大学依赖程度的增强,对大学的创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,大学必须很好地整合知识的传递、创造、加工与应用,为社会的创新不断注入活力,而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“学研产”相结合。现代科学技术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提高,很多时候需要工程教育、科学研究和社会生产的紧密结合,大学通过“学研产”的结合,可以加速知识信息的创造、加工、传播与应用,缩短科技成果商品化、产业化的过程,同时促进新思想的不断涌现,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科技人才的培养质量,使大学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。

总之,只有走进象牙塔,才有超越象牙塔;只有走进象牙塔与超越象牙塔相结合,大学才能更全面地承担社会责任。这既是由大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决定的,也是由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的。走进象牙塔与超越象牙塔相结合,是指肯定象牙塔的精神,并带着象牙塔精神走出象牙塔,以便更好地发挥大学引导社会的力量。而如果不这样,如果大学一味躲在象牙塔之中,不走出象牙塔,不用自己的知识为

社会服务,那么大学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,公众也认为大学是无用的;反之,如果大学不走进象牙塔,片面强调为社会服务,不注重发展学术,那么大学也就失去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特色。从根本上来说,这样的大学最终将失去其特有的理性精神和创新思维,因而也不可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;从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。

注释与参考文献

- [1] Ruth Hayoe. China's Universities 1895 - 1995——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. New York and London: Garland Publishing, Inc., 1996. 4
- [2][3][10] (美)约翰·S·布鲁贝克·郑继伟等译. 高等教育哲学. 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 1987. 12, 14., 15
- [4] 张祥云. 走出象牙塔之后. 上海高教研究. 1998(11)
- [5][6] 牟宗三. 中国哲学十九讲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7. 180, 181
- [7] 李工真. 德意志大学与德意志现代化. 见: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. 武汉: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, 1996. 55
- [8] Abraham Flexner. Universities: American, English, German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8. 5
- [9] (英)阿什比. 滕大春译.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. 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 1983. 12
- [11][12] (美)伯顿·R·克拉克·王承绪等译. 高等教育新论. 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 1987. 41, 43

(责任编辑 王宏章)